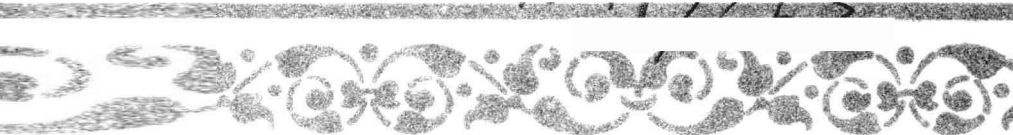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书

无辜者

【意】加布里埃拉·邓南遮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花城出版社



无辜者

〔意〕加布里埃拉·邓南遮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粵新登字05号

无 辜 者

〔意〕加布里埃拉·邓南遮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1插页 210,000字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360-1816-9

I·1537 定价：8.80元

内 容 提 要

《无辜者》是邓南遮《玫瑰三部曲》中最重要的一部，欧洲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在世界文坛颇有影响。作品描写贵族子弟图利奥生活放荡，背叛温顺善良的妻子，在外面眠花睡柳，不料却发现妻子与一作家通奸并怀了孕。他嫉妒、痛恨，但当妻子想自杀时，他又感情真挚地竭力劝阻。不明真相的全家人为小生命的诞生欢天喜地，图利奥却与妻子合谋要除掉他们感情生活上的这个障碍，最后他在圣诞之夜打开婴儿卧室的窗户，使之冻死。然而，事后他非常内疚，因为他明白婴儿是无辜的。整部作品情节非常生动，文辞优美，富有抒情性，将科学与幻想，自然与象征，人物的激情与变态心理巧妙地融为一体，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

译 本 序

——邓南遮及其《无事者》

加布里埃拉·邓南遮是在十九世纪末至廿世纪三十年代曾经轰动全欧洲文坛的诗人和作家。邓南遮不仅是意大利文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唯美派文学巨匠，而且是当时意大利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堪称一位在法西斯统治时期与纳粹头子墨索里尼并驾齐驱的历史人物。他那种大胆的铤而走险的精神，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那种“超人”的意志力，以及雄辩的口才，高雅的文采，加上他生活上的骄奢淫逸和对情欲的无节制的追求，使他成了全欧洲风靡一时的“超凡”人物。直到现在，人们每当谈起邓南遮，都认为他是个“无与伦比”、“非同寻常”而又令人不可思议的人物。

1863年3月12日邓南遮出生于意大利中部濒临亚得里亚海的一个名叫佩斯卡拉的小城市。据说出生时，他外祖母把四百里拉银币塞在他的襁褓里，意在象征他是披挂着银铠甲来到这世上的。幼年时的邓南遮，常依偎在祖母身旁，听她讲美丽动人的童话故事。邓南遮有三个姐妹，一个弟弟，身为佩斯卡拉市市长的父亲对儿女们管教甚严，邓南遮在童年时被送到一所教会学堂求学。中学时代的邓南遮就显露出非

凡的才华，不仅各科成绩优异，而且还酷爱文学，起早贪黑地阅读各国古典名著。邓南遮在少年时代就向往荣誉，“我喜欢受到赞美，因为我深知你们将为人们对我的赞誉而欢愉；我喜欢荣誉，因为你们为能听到我的光荣名字而感到欣喜；我热爱生命，因为它对你们的精神支持和安慰。”（1875年4月25日给父母亲的信）每当他在学校里受到校长的赞扬时，他就“两眼炯炯有神，心里感到无比喜悦而且泪流双颊。”他最崇拜的偶像是拿破仑，所以后来他就身体力行地竭力效法。

1881年邓南遮入罗马大学文学系攻读。当时，罗马是刚刚获得统一的意大利的首都，全国各地的工业企业家、投机商、政治家、文艺界人士都争相聚集在这里。邓南遮在上大学期间频繁出入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风流韵事层出不穷。《玫瑰三部曲》的第一部《欢乐》（1889）就是在此期间问世的，从此邓南遮就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使他在欧洲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继《欢乐》之后，邓南遮又发表了《无辜者》（1891）和《死亡的胜利》（1894），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玫瑰三部曲》，是邓南遮所有作品中最具艺术价值的力作。

1894年，邓南遮在威尼斯逗留期间，结识了当时红极一时的著名女演员埃莱奥诺拉·杜丝，这使邓南遮的文学创作有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长篇小说《火》（1900）就是描述他与女演员杜丝之间的恋情的。从此，女演员杜丝的艺术生涯就与邓南遮的戏剧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创作剧本《死城》（1898）、《焦孔达》（1899）的过程中，邓南遮曾与杜丝切磋，并由杜丝主演而获得了极大成功。然而，邓南遮生活上的挥霍无度，使他债台高筑而在经济上陷于困境，他在佛罗伦萨

近郊的别墅被抵押，家具被拍卖抵债，他不得不于1910年侨居巴黎，直至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才重返意大利。

1915年5月意大利对奥地利宣战。在巴黎侨居了五年的邓南遮回到了意大利，在探望了母亲之后即奔赴前线，参加了多次重大的战役，1916年他驾驶的飞机失事，迫降于海面时右眼受伤失明。在他被迫退役在家休养期间，写下了献给他母亲的动人的诗作《夜曲》(1921)。

邓南遮对他母亲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1913年3月13日，当他五十岁生日时，远在法国的邓南遮拍电报给母亲：“今晚我结束了工作之后，全身心地想着你。谢谢你使我变得如此坚强和勇敢。”邓南遮在养伤期间，曾把自己的母亲想象成米凯朗杰罗的杰作《圣母哀悼基督》中的圣母，把他自己比作圣母怀抱中受难的基督。邓南遮说《夜曲》是“我用血写成的”，是奉献给赐予他全部的爱，并与他共命运的崇高而又可敬的母亲的。

1919年11月，邓南遮反对意大利政府在国际和谈中所采取的妥协立场，认为承认意大利东北部与南斯拉夫交界处的阜姆城的独立，对战胜国意大利来说，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胜利”。于是他策动和指挥了一次向阜姆城进军的行动，率兵占领了阜姆城，并在那个“自由王国”当了一年的首领。后来意大利政府军为执行国际协议，受命把邓南遮指挥下的军团驱逐出阜姆城，邓南遮在身负轻伤之后退出了阜姆城。

此后，邓南遮就一直隐居在意大利北方加达湖畔的维多利亚莱别墅里，他深居简出，接待各方人士和好友，墨索里尼也曾多次登门造访。尽管墨索里尼一方面对邓南遮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另一方面却又派出以一名警察头子为首的警

卫队对他加以“特别监护”，然而邓南遮却始终未正式加入法西斯党，对法西斯若即若离，喜怒无常，有时坦诚相见，有时缄默保留。邓南遮在晚年时的情绪是伤感的，忧郁的，在他的遗作《密书》中，他感慨地叙述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忏悔地写道：

“目睹这惨淡而又痛苦的人生，我真想抹去自己曾有过的
那些经历——如今想起来真令人毛骨悚然——真想抹去加
布里埃拉·邓南遮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抹去这样一个文艺家
和英雄的存在，抹去这样一个与过去休戚相关，又与今后的
生存紧密相连的人物，抹去与他说过的话、写过的篇章，声
明过的并且实现了的业绩紧密相连的英雄般非凡而充满情欲
的一生。”

1938年3月1日，邓南遮因突患脑溢血而逝世。3月2日清晨，墨索里尼亲自去邓南遮的住所向他的遗体告别。葬礼是按宗教仪式举行的，庄严肃穆。当时意大利政界要员都出席了葬礼，意大利国王也派了代表出席。邓南遮的遗体是立着埋葬的，葬礼上演奏的是他本人事先选定的贝多芬四重奏交响乐曲。

综观邓南遮的一生，不难看出，他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生中孜孜以求的是在冒险的军事行动中创建所谓“英雄业绩”，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从侨居了五年的巴黎赶回意大利，参加陆、海、空军的一系列战斗，他驾机飞到维也纳上空散发印有意大利三色旗的传单，还挥舞马刀驰骋疆场，他曾获两枚金质奖章、三枚银质奖章、一枚铜质奖章，并三次获得军功十字勋章，三次晋升；1919年冬天占领阜姆城的军事行动更赤裸裸

地暴露了邓南遮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尽管他不是出于个人对领土和权力的野心，但充分反映出他那种“强权意志论”的实质。战争对邓南遮来说，是实践他“难以效法”的生活的最好的机会。

在法西斯统治时期，邓南遮又是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1926年，墨索里尼派遣的法西斯军队在北非的的黎波里登陆以后，邓南遮寄给墨索里尼一组题为《远洋业绩颂》的诗篇，为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涂脂抹粉，诗中还肉麻地吹捧墨索里尼：“今天你的每根血管里都洋溢着活力。”他虽然没有正式参加法西斯党，但深为法西斯所赏识，墨索里尼本人对邓南遮也推崇备至。1927年成立的国立学院就是一所研究和推广邓南遮全部著作的学术机构；1928年邓南遮病卧床期间，墨索里尼曾多次去登门看望；1929年邓南遮患阑尾炎开刀后，墨索里尼立即亲自去探望；1937年邓南遮又被任命为意大利科学院院长，只是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虚弱而未能尽职而已。

然而，邓南遮却又是意大利唯美派中一位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诗人、作家和剧作家，他的数量众多的作品对后来整个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在文学写作上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也是非凡的，“我从早上十点钟工作到晚上十点，然后，稍稍打上两个钟头瞌睡，半夜里又着手写作，一直到清晨鸟儿啼鸣为止。”（《晚邮报》，1928.6.14）他就是以这样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还有多部剧作，它们连同他一生写下的多达四万行诗句的诗歌作品，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唯美主义流派的文学宝库；邓南遮生前在他留给后人的几百页

《密书》中自豪地写道：“发奋地学习、学习、再学习，使我成了这样的巨匠，我善于表达他人无法表达的东西，我的写作风格也超越了多少世纪以来所有的人所写过的。”

邓南遮及其所代表的颓废派文学(或者叫唯美派文学)的产生是有其客观的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在十九世纪末年，作为世界经济、政治中心的欧洲，已逐渐失去了它在全球的统治地位，欧洲资产阶级社会面临一种深刻的危机。意大利的知识界和文艺界也普遍存在着一种危机感，对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进步和民主失去了信心，不再笃信理智和科学的力量；大工业生产导致了人的个性的消亡，使文艺界和知识界人士失去了本身存在的社会价值，深感自己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从而有一种孤立感和陌生感。当时邓南遮的一番感叹正恰如其分地反映了这种心态：“试验已经完成了，科学已无法证实那已被屏弃的天地，平静安宁的灵魂已被科学所毁灭，而且科学再也不能使那蒙受过创伤的心灵得以拯救……我们不愿要什么真理了，给我们梦幻吧。我们唯有生活在未知世界的阴影下才能得到安宁。”(《在生活和在艺术之中》，1893)

这种心态来自于文人们的主观愿望与历史现实之间的失调与不平衡，他们开始探索自身的社会价值，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妄图逃避现实，对抗被科学技术主宰的工业社会，着力于表现个性，追求单纯的形式美的文艺流派，即颓废派。对于颓废派文人来说，艺术成了人的存在的最高价值，人只有在艺术中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它是超脱于任何社会、伦理和教育的目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邓南遮在作品中竭力探寻生活与艺术的交融，即颓废派艺术家所追求的梦幻。他认为“生活就是艺术”，生活应该像艺术一般美，他在文学创

作上就着力于探求那“无法效法”的生活中的美的意境，“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一幅镶嵌画一样的装饰品，力图用文学语言来雕琢出一种‘难以效仿’的生活”。（见萨佩尼奥《意大利文学史》）

这种唯美主义的创作思想充分体现在邓南遮的一批文学作品中，从而揭示和捕捉蕴含在现实生活中美的内在实质：“生活是美和力量两种形式永恒的交替，是声音和色彩的交响乐，声音、色彩与大自然交融在一起时，人们就能从中享受无上的乐趣，领略狂热的激情。”（《在生活和艺术之中》，1893）

所以，尽管后人对于邓南遮的作品有各种各样的评论，争议也很大，但有一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那就是意大利二十世纪的许多作家，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邓南遮创作思想的影响。意大利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维塔利亚诺·勃朗卡蒂（1907—1954）曾这样评论过邓南遮的作品：“我在青少年时期就拜读过邓南遮的作品，读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们像是一个奇妙的装置，大大地增强了人的听觉、嗅觉、视觉和触觉：芳香、光线、声音和触感一齐向你涌来，我小小的知觉犹如一根发疯的指南针似的胡乱地作着反应。”（《资产者与无限》，1938）从这段评论可以窥见邓南遮作品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小说《无事者》的主人公图利奥·赫尔米是一个贵族的后裔，一个玩世不恭的丈夫。他多次私下与情妇幽会，背叛温顺善良的妻子朱丽亚娜，后来当他意外地发现朱丽亚娜与一位作家之间有隐秘的关系之后，精神上异常痛苦，接着他又

进而得知妻子与那位作家的关系而有了身孕的消息之后，内心深处悔恨、内疚、嫉妒、痛恨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他开始精神恍惚，甚至想自杀。不知内情的老母亲对已有身孕的儿媳却体贴入微，忙着为即将降生的婴儿准备衣物，婴儿出世后得到了“祖母”百般的宠爱，这越发使图里奥感到憎恶和反感，于是他暗中谋划要害死新生婴儿的计划。圣诞节前夕，图里奥乘全家人都去教堂做圣诞祈祷之机，支走了守护在婴儿身边的奶妈。当留下他独自一人时，他故意把婴儿的卧室门窗敞开，并把婴儿放在窗台上受冻。隆冬时节刺骨的寒风吹打着本已病弱稚嫩的婴儿，受了寒的婴儿因患并发症不久就死了，全家人沉浸在悲哀之中。图里奥所刻骨仇恨的婴儿不存在了，然而他自己灵魂深处却笼罩着深重的阴影，眼前不断浮现出婴儿握成拳头的小手，还有那半张着的发紫的小嘴……他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恨那个孩子了，因为他深知孩子是个“无事者”！

《无事者》是一部采用第一人称方式叙述的小说，风格朴实无华，文笔流畅，文辞优美，富有抒情性。由于当时作者想使此书的风格有所创新，使它有别于前一部小说《欢乐》刻意雕琢的文采，以能突出“精神道德”方面的深度，所以突出地描述了图里奥和朱丽亚娜追求“纯洁”爱情的悲怆、忧郁，以及折磨人的内心烦恼，并着力刻画主人公悔恨、痛惜既往的心理。然而，主人公图里奥“某些中枢神经的膨胀，使他无法对自己正常的精神生活予以必要的调节”，所以他时而令人厌恶鄙夷，时而又那么纯洁高尚，时而冷若冰霜，时而又那么亲切多情，时而暴跳如雷、怒不可遏，时而又那么冷静清醒、令人信赖，这种种表现正是他精神上失去平衡的表

现。他老母亲及其兄弟和管家人的那种善良、仁慈的心灵也没有能驱除图里奥罪恶的邪念，最后他动了杀机，扼杀了摇篮里的无辜的幼小生命。不过，事隔一年之后，图里奥很想忏悔，但这并不是他出于人性论的反思，而是因为在脑神经高度紧张的状态下，竭力想为他昔日的淫荡和残忍行为寻找一个具体的归宿。正如作者后来在《夜祷录》中的《视觉神经》篇中所提到的：“它（指犯罪行为）进入到我前半生文化和生活中的所有的层次之中，并在我的视觉中反射出无数的形象。”

小说的故事发生的环境是罗马的一个贵族家庭，一所坐落在罗马市郊供贵人幽会的别墅，一个击剑比武厅和一个书房，主人公是拥有丰厚田产的一个富贵人家的阔少爷，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精神极度空虚和失调，他与生性忠厚、心地纯洁的老雇工乔瓦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对罗马近郊优美景色的描绘很有诗意，充分体现了作者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对女主人公朱丽亚娜秀丽动人的描绘也很有独到之处，但作者过多地把笔墨花在赞颂她作为女性的魅力上，而没有突出她无辜的一面，这乃是作品的不足之处；另外，作者用很大的篇幅描写主人公图里奥矛盾的思想心理，而对他的形象却缺乏应有的描绘。

《无事者》以它独特的艺术风格，结合了科学与幻想，自然性与象征性，把人物感情上的激情和变态的心理尽善尽美地用富有音乐性的艺术散文形式表达了出来，既有仿古风采又有新颖的词语，既有人物形象的细腻刻画，又有反映复杂心理状态的独白和对话，而且故事结构严谨，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饱满，从而使该部小说成为邓南遮所有作品中最优秀

的一部。

在语言的运用上，《无事者》充分体现了唯美主义的艺术特色，全书充斥了隐晦、神秘、虚无的形容词、副词和叹词，尽量回避使用具有实在含义的名词，使用了大量反映人物心理状态的抽象的哲学术语，使人产生一种深邃莫测而又虚幻的感觉，给予人一种梦幻，增强了作品的抒情色彩。

《无事者》是邓南遮从1891年4月至7月幽居在距佩斯卡拉城不远靠海滨的弗朗卡维拉的一家修道院内写成的。7月14日他告知出版家艾米利奥·特雷维斯(1834—1916)书稿已就，8月5日即可发往米兰。邓南遮在给特雷维斯的信中写道：“我对作品是满意的，因为它能使一个要求严格的人满意。”

书稿封上了七道铅封，于8月10日寄到了米兰。出版家艾米利奥·特雷维斯在把书稿送至工厂排印之前，在炎夏酷暑，忍着身体不适，躺在床上仔仔细细地读了起来，因为邓南遮的《欢乐》一书出版后曾一度舆论哗然，尽管小说的出版在文学评论界取得了成果。在读完书稿之后，特雷维斯认为他的出版社无法出版这部小说，因为当时在他看来，此书是极端伤风败俗的。于是，书稿又被封上七道铅封原封不动地寄回给了邓南遮。面对意想不到退回来的书稿，邓南遮很有礼貌而又无可非议地回信责问道：

“亲爱的艾米利奥先生，贵体欠安我很难过，祝您早日康复……读了您的令我意想不到的来信，我也很难过。您对我的小说的评价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我的书是意大利近五十年以来所出版的书中算得上最有道德内容的，对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指《战争与和平》)，我在书中只引用了一

段，其余都是我自己写的，完全是我自己的创作……您把我的创作称之为‘老一套’玩意儿，可我在仔细地、准确地研究了一番之后，却觉得它是一部卓越的道德性小说，经过我的分析，它是一部新小说，没有什么‘雷同的千篇一律’的东西……更谈不上什么‘大同小异’，这是千真万确的。书的每一页都能明显地证实我的这种看法。这全然是真的。我为自己完成了一部充满良知和十分严肃的作品而感到自豪。书中的重复之处是我有意那样写的，那完全是出于艺术表现的需要……但愿我的书今后将会取得的成功，会使您因为没有及时把它付诸铅印而感到惋惜。毫无怨恨之意的……”

“许多文人和朋友……都读了我的手稿，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发现有任何一句话是不能出版的。大家一致认为，我的书有着深刻的道德内容，而且是严肃的。”（1891年9月20日给出版社的信）

但是，特雷维斯的出版社还是不予出版。

《无事者》于次年在《那不勒斯晚报》上连载（自1891年11月至1892年2月）。连载小说引起了一位法国哲学教授乔治·赫胥尔的极大兴趣，他写信给邓南遮，建议他翻成法语。邓南遮阅信后十分高兴，他在回信中写道：“您昨日的来信对我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圣诞礼物，它令我十分愉快。”1892年，《无事者》以《闯入者》为书名的法译本问世，发表在法国《时代》杂志上；《无事者》在法国的发表，把诗人邓南遮的名字带到了法国，尽管当时他遭到了意大利文学评论界的贬责和恶意中伤。小说发表后，引起了法国文艺界的极大兴趣，在短短的两年之中，在法国的若干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十来篇重要的评论文章，几乎所有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小说音乐般

的魅力。《费加罗报》还把《无事者》放在给度假的人们推荐的参考书目的首位。小说首先获得了法国小说家保尔·布赫热(1852—1935)的好评。一家态度严肃的杂志社(《两个世界杂志》)还约请邓南遮以《无事者》的主人公《图利奥·赫尔米的新回忆录》为题继续写下去,或者另写一部小说,并要求他于1894年之内完稿。

《无事者》在德国也引起了重视,有些评论家在《圆桌会议》杂志上,为意大利文学批评界的迟钝和低劣的鉴赏力而感到惋惜,并写道:“希望最终能出现对作者的公正的评论。”在《无事者》问世后的最初两年中,各国发表的评论文章多达七十余篇。

以真实主义作家路易吉·卡普阿纳(1839—1915)为代表的当时意大利文学评论界,曾说邓南遮的“言语和文句像是个充满狂想的寻欢作乐者的谈吐”,认为“那种想逃脱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梦幻又重现了,小说既充斥了对华丽奢侈的室内装饰摆设的贪求,对娇艳浓妆的女人的追求,而且还把语言看作是私人乐队。”卡普阿纳在1892年4月24日《圆桌会议》杂志上激动地评论说:“艺术作品是活的形式”,而且“光这么说不行,得让人感受到这一点”,意即小说被认为“缺乏真挚性”,这对邓南遮来说,是个意料不到的打击;几个星期之后,另一位评论家艾乌吉尼奥·盖基在《星期日新闻》上论定该小说是“一个敏锐有余,深度不足的才华横溢的人的可爱的精神失态。”

当时的读者与评论家对《无事者》的反映很不一致。大多数人认为,邓南遮对故事中人物的病态的刻画和描写过于粗犷了。小说在妇女界曾风靡一时,很受欢迎,对此,邓南遮

颇感欣慰。小说《无辜者》的问世还引起了科技界的重视，一些专业性的刊物上都提到了它，1893年10月1日的《新期刊》杂志上，一篇以《疯狂的罪人》为题的文章中，谈到有人认为邓南遮塑造的主人公图利奥“完全符合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中最大胆的研究成果。”这是因为，从创作风格上，邓南遮的作品具有一种试验性心理学的特点，描述了人在“一时的激情支配下的情感冲动以致丧失理智，犯下令人意想不到的罪行，乃是心态失去平衡的人的反常行为”，而当时弗洛伊德关于“癔病”的研究文章还没有正式发表。所以，《无辜者》具有反映处于初步萌芽状态的尼采主义超人思想的特色。

“《无辜者》产生于痛苦，我是从痛苦中得到创作的启示和灵感的。”（《给乔治·赫雷尔的信》，1892年11月）所以，《无辜者》在《玫瑰三部曲》中，从思想意境上更富有深刻的道德内容。当时的邓南遮因感染了疟疾，时常发烧，而且因在罗马挥霍无度而负债累累，思想消沉，但作家以顽强的毅力写完了这部小说。

1890年前后，邓南遮曾从事过广泛的科学实验和研究，从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示。当时在意大利对神经病理学的研究很行时，人们通过观察、分析、推理的方法去认识人类的蜕化衰竭的心态。为了在小说《无辜者》中对婴儿的患病和死亡予以准确的描述，邓南遮还仔细地作了医学上的研究，并加以查实考证，所以从医学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描述是无可击的。

《无辜者》在当时被普遍看成是一部资产阶级骑士小说，曾在欧洲轰动一时，就连原先拒绝出版此书的特雷维斯出版社也于1895年买下了小说版权，改变了封面和封底的装璜设